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少数的 法则

〔美〕路易莎·
校真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少数的法则

[美] 路易莎 著

校 真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序言并致谢.....	1
第一章 引 言.....	1
不易确定的对象.....	3
世界范围与偏僻地区：地缘政治和国家经济.....	5
文化、结构和实践.....	9
文化生产工作.....	16
现代性和作为文化生产的民族主义.....	21
民族志概况.....	25
各章节概要.....	28
第一篇 民族 / 话语表象.....	31
第二章 起源与族名：竞争史，生产性的民族学.....	32
起源与称呼：苗族历史编纂学中的不同声音.....	33
“苗”一词的来历.....	34
与其他族群的关系.....	38
地理起源.....	42
历史背景下的苗族.....	45
民族学概要.....	47
简述苗族概况.....	49
有关文化譬喻的争论.....	52

塑造民族本质：何谓重要标记？	59
民族的形成与苗族的确立	62
第三章 民族之建立：国家，识别，分类工作	64
不同民族地域的臣民的形成	68
资源和资本：在国家经济规划中的大西南、贵州和苗族	71
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与民族形象	76
加入民族事业	85
从民族识别到身份认定	89
第四章 内部的东方主义：性别和中国的他者的大众化	94
内部的东方主义	96
民族主义的他者	101
两类民族主义特点，多样化的他者	103
捕捉西江风情	111
解读内部冲突：妇女和外来者	115
体验浪漫	120
传统和现代性中的妇女形象	122
内部话语	124
第五章 重建主流话语	127
有国家名分的自由职业者	129
国家、社会、追求自治	133
让世界消费的国家形象	138
改革时代的国家货币	141
西方的审美观：与国际惯例讨价还价	142
对性话语的挑战	145
商品化和国际旅游规则	146
苗族男性	149

收获季节的现代化话语.....	151
大众的共识，统一的话语.....	153

第二篇 身份与文化斗争..... 157

第六章 商业性表演：走向市场化..... 158

毛泽东时代的罗秀英.....	159
宣传和群众艺术.....	165
表演的真实性：凯里实例.....	172
现代的原始：金瓯的创作.....	174
后代的繁荣.....	175
观光节日：龙船节.....	179
结论：阿略的没落.....	183

第七章 文字、服饰艺术和国家：呼唤文化回归 ... 187

搜集经典.....	188
艺术，怀旧，遗产.....	190
性别和多样文化的融合.....	191
恢复礼仪.....	195
西江的仪式节历.....	195
国家的支配.....	197
招龙仪式.....	200
洋排村的招龙仪式.....	201
规则，控制，保护.....	204

第八章 摆脱从属地位：变化的他者 206

吸纳传统的苗学研究.....	207
摆脱从属地位.....	208
露天表演和乡下亲戚——多元视角.....	212
在婚姻策略中建构差异.....	215
观察吃新节.....	218

新型对歌.....	225
动员起来的现代性.....	226
第九章 民族现代性的表演	228
婚礼的活动.....	228
表演性的理论及实际表演.....	232
礼物占据的位置.....	236
年轻人的表演.....	239
迎合学术的四月八节日.....	242
舞蹈中的怀旧情结.....	242
一首先锋之歌.....	244
表演未来，令现在复杂化.....	246
第十章 结 论	248
民族 / 失落 / 斗争.....	249
女性的关键位置.....	252
国家现代化.....	255
附录：关于本书的重要书评	257
评路易莎的《少数民族准则》.....	257
参考文献	262

第一章 引言

在某个地区，我访问了当地的每户居民。要离开的时候，我把针线交到女主人手里，而她总会跑着去找来一块绣片叫我们带给毛主席，“因为他喜欢我们的绣片。”苗族妇女围着我们正在唱歌和游玩的女同志，把绣片绑在她们身上，几乎把她们包住。这些是妇女最心爱的信物，通常只会给她们的
情侣……

——费孝通，《中央访问团记事》，1951年

中国顶级人类学家费孝通^[1]先生代表中国共产党访问了贵州省少数民族苗族，遂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苗族。我首次阅读这篇短文时就被深深迷住并难以释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何以会这样。仔细揣摩其中含义，

[1] 费孝通，生于1910年。研究社会学的中国学者，早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师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门下。1949年后作为农村田野考察和人类学学者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副校长。1950年代参与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民族分类工作并专门负责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被划为右派，1980年改革开放后得到平反并恢复原职。（Arkush, 1981；Guldin, 1994；McGough, 1979）详见下列各条。

我才发现：我这本书里的许多主要内容，在他的短文中仅用几句话就概括起来了。他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正值少数民族被定名的时期。定名也伴随了社会身份的确定。于是我想，作为正式被认定名称的、并拥有自身社会地位的少数民族，汉族是如何和他们打交道的呢？共产党的干部真会把针线发给苗族妇女，而苗族妇女定期把她们的手工刺绣交给干部，并相信刺绣品会转到敬爱的毛主席手里吗？毛泽东喜欢苗族刺绣吗？如果喜欢，意味着什么？这些针线的赠品是否可看作苗族妇女借以表现自己美丽的文化形象并传达某种呼声呢？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本来有深刻性别含义的礼物赠送呢？——苗族农村妇女把她们自己的刺绣信物大方地献给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如果是妇女干部，怎样处理手工艺品礼物呢？苗族妇女渴望共产党代表团去体验她们的家乡生活吗？如果是一位汉族的专家讲述这个故事——在共产党解放中国的历史关头，这种有关深情厚谊赠送礼物的寻常故事，人们如何看待呢？

《少数的法则》一书，关乎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关乎话语的产生，即民族性、性别、及现代性的产生，关乎被视为“有差异”领域以内及周围的人使用的策略。我记在这里的民族志目的是要表明：建立并坚持社会等级，文化至关重要，因为等级制度就是对一部分人的排斥和弱化。正是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那个部分的出现，导致了复杂的行为领域，其间，面临不同形势的文化行为者协调他们的位置。在此过程中，具有不平等的错综结构的社会秩序，不仅被再生产出来，而且其自身往往是并不平衡的。

本书描述中国，同时也描述了民族学所关注的少数民族——苗族。本书的时间跨度为1980—1990年代，那时中国正着手实施可称为“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计划。中国将以一个全新的角色跻身于全球经济当中，于是它对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也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种改革涉及到了整个国家，也涉及到了那些同变化着的外部世界并无太大关系的人群。

我的实地考察工作开展于1980—1990年代初这段时间。此时期，新的前景和现代性已经是必然趋势，它像一座分水岭标明了毛泽东时代到此告一段落。但我的研究计划往前会涉及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9），即20世纪前半叶甚至更早；往后则延续到后毛泽东时期的文化生产。这在历史上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期，匮乏的

学术有待复兴，因而要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背景，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文化政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在西方，人们仍然普遍地认为中国有着纯粹、单独而古老的连续文明。西方认为这是辨识中国的主要特征，而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正是要改变人们已经有的成见。我认为，中国的特征长久以来就不是单一的，这中间，文化他者在一个高效率管理制度下起着多种的作用。中国人被描述为总是和当权者在同一个文化立场上。这样的现状一直延续到后毛泽东时期并且还在不断加强，即思想上统一的民众团结在一个政治中心周围。我不同意这样看待社会，当然我也无需直接反驳，我给出的有力证据可以说明：民众的意向在某些时候和国家的计划是相契合的。要了解中国的支配权和等级结构，流于表面的评论远远不够，必须深入民众，了解他们的行为和并不公开的那一方面。

我认为中国固有的统一模式中间存在着相异性，并且我要进一步问道：这种差异的基础是从哪里来的？处在一定社会位置中的人，如果遭遇那导致社会等级基础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分化。我这样说，并非要否认差异，而是要着眼于形成差异的作用过程，在此过程中，无限多的标记被印上社会烙印或具有政治意义，在构建社会秩序中制造出特殊差异的固定条件——民族的差别、性别的差别、阶级差别、社会地位的差别等。这里我无意探索大众文化是如何创造同一性的——无论它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体制模式在达成统一的同时也在培养并创造差异。

不易确定的对象

1949年后被归入苗族范畴的人民，成为中国第五大的少数民族成员。该民族人数众多——1990年时达到739万。^[1]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承认并

[1] “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各民族人口，”《北京周报》33（52）（1990年，12月24-30）：34。（见人口统计表，70页）

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大众文化也是广为人知的。但那些出现在公众场合、有固定身份的苗族人究竟是谁呢？要想确定他们的真实标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散居于不止七个省份，人口密度集中的地方是贵州、云南、湖南三省；他们说好几种方言，不同方言彼此间并不相通，不同地区的苗族彼此也很少接触。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以居住地区不同而分别种植稻米——旱稻或水稻、玉米、马铃薯、荞麦或别的谷物。其中一些已长期在山谷定居下来，另一些过着半农耕生活，他们在山坡上烧除植被开出农田种植庄稼。

中国境外的苗族多已分布到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1]在这些地方，他们自称为 Hmong。在中国，苗族有几个名字，Hmong 是现行名称中的一个。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高地 Hmong 人在老挝参加抵抗共产主义的秘密战争。结果，美国 1975 年从印度支那撤军后，这些人大都沦为难民。此后，Hmong 人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属圭亚那，以及西方各国。分散对于大多数 Hmong 族人，意味着结束农耕生活，开始了作为少数群体享有工资劳动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新的生活方式。

本书要想廓清“苗族是谁”的问题。本书主张，此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些人居住的特定国家、特定地区。因此，本书尊重他们现有的身份定位，将他们视为中国国家内的苗族进行研究。尽管我没能向读者提供原生态的、独立的苗族现状，我仍旧努力将他们和中国境内外的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严肃地考虑他们试图给自己作的定义。尽管把重要的族群能动属性归给苗族人，我的叙述还是避免把这里的“苗族”说成是单独的、同一的能动者整体。如果苗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她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类别，需要经过文化场所中的无数操作运行，然后方能产生并具体化地呈现。最终，我所研讨的内容便是这样一个范围：从苗族人的所为所行到他们置身其中的更大社会背景。此背景给他们传达信息并消除他们所谓的差异；从被定义的苗族一类到与之相对的汉族一类；从苗族人因本地奇风异俗而富于魅力到他们自己委身的蓬勃扩张的现代性。

[1] 见米肖 (Michaud 1997) 苗族移民概况的近期文献。

世界范围与偏僻地区：地缘政治和国家经济

苗族和许多别的少数民族——中国“内地”的农民和牧民——长期以来都以他们的“偏僻性”著称。他们被描述为居住在闭塞地区与世人隔绝的群体，被看作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带，无法融入中国大都市中心的生活脉搏，甚至无法与富饶的农业地区相兼容。如拉尔夫·李卿格（Ralph Litzinger）（1994）指出，在中国人的想象中“偏僻”一词有两个意义，一是意味着浪漫色彩的、笼罩在神秘美丽当中的原生态风景地区，另一层意思蕴含着“边缘地区”之意，即“落后的、未开化的野蛮之地，经济和社会落后的地区，土地贫瘠的中国山区农村，在这里，一无所有的穷人挣扎在极度贫困之中”。想一想作为和“进取的、充满活力的、刚健的、为主的”男性相对一方的女性的含义，我们就可以体会具有这些特征的“偏僻”意味着什么。（1994：206）

深入到中国历代帝王统治的历史，西南自古是一块充满政治斗争和资源争夺之地。明朝时期（1368—1644年），一次移民大潮（Lee，1982）使该地区人口翻了一倍，自然也导致了各方面更大的差异。由于居住人群的多样性，——有各种民族居住在这里，包括从北方来的，他们因为耕地匮乏而迁徙到这里——该地区包容了多元文化、各种不同的语言，以及各种形式的统治方式。况且，该地区有史以来远离交通和贸易，且居民又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偏僻”就恰当地表达了其特点，但如此定义却掩盖了一点，即苗族人和他们的居住地长久以来都关系到中国和外部的联系——关系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无论是他们的地域还是他们的话语都如此。

西南地区曾是边疆之地，因外来力量的入侵，成为一个庞杂的绝不单一的地区，这里的统治方式也是多样的，因此引起的常有边界问题、税收问题，且经常发生你争我夺的战争。当清朝（1644—1911）政府想要将帝国疆域扩大一倍时，在西南地区早已建立了行省制度。这里正经

历着米尔沃德 (Millward, 1996) 说的“边界过程”，既有内部殖民化的冲突，也有不时发生的暴动。^[1] 从汉族统治的明朝到 17 世纪中叶满族统治的清朝的过渡期，西南地区既是要塞也是战场，而由于国外贸易和防御的需要，使该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来自邻国老挝和缅甸的使团直抵云南，东南亚的茶叶丝绸贸易欣欣向荣，有时候，这个地盘还可作为到达缅甸和西藏的军事基地 (Naquin & Rawski, 1987 : 199)。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卷入中国在东南亚的抵抗英法的战争。(Moseley, 1973 : 25-26)

该地区矿产资源逐渐引起政府注意。18 世纪，国外白银进口量日益增长，因而铜矿的开采迫在眉睫，在清政府支持下，铜矿开采增加了十倍，从 1700 年到 1850 年，该地区铜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而铜矿业的繁荣吸引了更多的移民，150 年里，本地区人口膨胀四倍。来自北部和东部移民发展了城市与都邑的文化，对于农村的乡下人——其中许多都不是汉族——这样的都市文化原本是遥不可及的 (Naquin and Rawski 1987 : 199-202)。

另一种使苗族人和外部大背景发生联系的重要产品就是鸦片。鸦片在苗族中间并未被广泛使用，即令文化祭祀活动中也用不到鸦片，它仅仅是用来治病的药物。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苗人们却因三个原因在中国境内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英国人将印度的鸦片作为贸易项目带到中国，随着吸食成瘾的人渐多，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需求量也在持续上升，特别是当中国政府努力削减鸦片输入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又因为中国政府竭力禁断国内的鸦片生产，于是促成了在较少受钳制的山区和少数民族散居地的罂粟种植。结果，苗族中的半农耕者们发现：这种作物特别适合他们流动的生活方式，非定居的农业生产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更便于携带的商品来换取现金，以便购买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2]

[1] 米尔沃德 (Millward, 1996 : 123-24) 将边疆管理的主要情况表述如下：(1) 当地首领的间接治理，(2) 外来汉族旅居及移民，(3) 努力保留汉族和非汉民族各自的文化和其间的界限，(4) 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的交往规则。

[2] 关于苗族和鸦片，详见葛迪斯 (Geddes, 1970, 1976) 及格兰德斯塔夫 (Grandstaff, 1979)。见肯普 (Kemp, 1921) 关于 20 世纪早期贵州山区种植罂粟的第一手报导。

非汉民族自元朝以来就被所谓的“土司制度”统治（Jenks, 1994 : 30-41 ; 《苗族简史》1985 : 73-105 ; Sutton n.d.）。这是变相的古代“以夷制夷”统治方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间接的政治统治，其间，当地上层被纳入世袭的、有官阶的国家机构，作为官员向被统治者征收税金、收取贡品。清朝对土司继任和让当地接受中国礼仪文化的要求日渐严格，雍正时期（1723—1735）的改土归流的政策（让有任期的流官来取代当地的首领）实质是为了最终完全取代当地人的统治。这一政策曾引起一系列的暴动起义，特别是1720年代的苗族起义。

苗族人民臣服于官僚统治的程度，以“生”和“熟”来区分。这样的用词一开始就带有贬义，但却流传甚广。“熟”苗指的是那些定居于离汉人较近的固定村落的苗族，他们受当地政府管辖，交纳赋税并服役，表现出接受一些中国汉文化的影响。“生”苗指那些不受管束、从不交税、不服劳役的苗族人，他们的居住地在汉人眼里更加偏远和闭塞。^[1]直到1940年代，德国人种学家鲍克兰（Ines de Beauclair）才记录下黔东南雷公山附近的“生”苗。40年以后，我的实地考察便在这里展开。^[2]

用“生”和“熟”来区别两种可以和之交往的苗族的不同模式，便将社会现实的存在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社会现实中各种方式的交易、融洽、对抗以至冲突，都只以苗—汉关系为特点。例如19世纪早期，一位湖南著名学者就曾写文章贬低苗族社会结构，说他们是无头领的组织。虽然他的文章主要描述了“生”苗的野蛮和不受教化，但同时也证实了苗汉之间的关系，以及汉族对苗族社会的影响：

“生”苗分散居住……其住地交错如同犬牙。有部落，却无首领。通常，他们不爱惜生命。在一个领地内，争抢作首领地位的争夺发生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之间，这些人之间或是父子或是兄弟。他们中间，有会说汉话且能与官家打交道的，就会得到当地人的敬重，成为首领。

[1] 迪科得（Dikotter, 1992: 8-10）坚持说，这种分类在分类文本中有坚实的基础，所谓二元的，亦指谈到的民族是否将食物烹调熟再吃还是直接吃生的。以20世纪非洲奴隶为参照，他以生吃或熟食食物为区分种族之证据，这样可显示生理上的区别：他们（非洲人）生吃食物，当他们被囚禁并连续几天吃熟食时他们会患腹泻，有时会病倒甚至死去。

[2] 德波莱尔（DeBeaulair, 1970: 65）报道说，当时的黔东南流行“生”吃习俗。这已成为划分苗族下属支系而非其行政区划的标志，18世纪苗族被首次征服以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划分方式仍被沿用。迪科得还发现明朝就有化外生苗一说，指中华文明以外的苗族。

本书所讨论的是 20 世纪后期的事，在本章要提出，苗族人的声誉从来都无法摆脱那些围绕着他们的观点（Tapp, 1989 : 177）。然而，18 世纪和 19 世纪中代表苗族人生动活泼的文化生产证明：他们并未屈服于那些“文化他者”，他们在民族冲突时被列为异类。最著名的图文并茂的《百苗图》就是一例，它把苗族定格为奇异的和野蛮的。该画册产生于 18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其中描绘了各种苗族和别的族群，每种都标有名称，有些图画说明使用的是汉语文言文。据霍斯特勒（Hostetler, 1995）考察，这些图画，是清朝政府为了提高治理的稳定性而特意汇编的有关其治下臣民“科学知识”。可它们仍然不离旧式的漫画，仍属“观赏性的描图”。它把某些行为活动当作某一支系苗族的特征，如狩猎、求婚、斗殴等等。（Hostetler, 1995 : 44）总之，从汉族的视角出发，这些画中强调了两个非常规的地方：既没有较大范围的村社或家族谱系；也主要表现对象的社会性别角色颠倒和性错位。（Diamond, 1995 : 103）这些绘画暗示出混合文化背景下的“野蛮形象”。^[1]

考虑到当时的那种专断性的政治，刻意描绘苗族的社会性别和性习俗就是不足为奇的事。因为来到西南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是男性，当地的妇女（包括非汉民族妇女）必然会引发后者极大的矛盾心理。对这些男人，她们极可能是异性的婚姻伴侣，但同时她们又是禁忌对象，两性间的亲密行为便是不能容忍的。据谢弗（Schafer, 1997）所作《唐代外来文明》——其书涉及公元 618—907 年这段期间——说，当时的南方女子一直都使北方来的移民和旅行者着迷。妇女性感动人的形象出现在诗歌里，如“身着彩罗衣，腴笑溪河畔，频向远来人”。（Schafer, 1967 : 84）但源自母系社会的世袭地位以及掌握萨满巫术的技能也使妇女威胁到男性首领的统治。随着 19、20 世纪民族间隔阂的强化，对南方社会性别规范的诽谤更加严重，如果渴慕非汉民族妇女，就成为更不道德的事了。

在 20 世纪，贵州省多次成为影响苗族军事和经济行为的重要地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1934—1935），把他们的根据地从赣东地区转移到陕北地区，长征的路线就经过了贵州苗疆。据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江

[1] 比较穆兰尼（Mullaney, 1983）的欧洲后文艺复兴情感——奇妙的他者文化探寻——与 20 世纪调查及分类即民族志的热情之区别。

西农民回忆：“当地苗人害怕红军，他们不敢呆在家里，而躲藏到山中。按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军队就意味着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烧房子以及抢夺大米和谷子”。（Salisbury, 1985 : 106）^[1] 红军经过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制定他们少数民族政策的依据之一。共产党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斗争中，遭遇了严重的冲突和激烈对抗。这让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要考虑争取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信任。当时，也有一些苗人被说服加入红军并参加了长征。^[2]

1949 年解放之后，中央政府通过重新组织生产（土改及合作化），发布了一系列的财政的和其他的决策，推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行动，以全面整顿农村社会。后面还会对此详细介绍，西南地区成为了国内的“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基地。为了国家的利益，加快了那里的矿产资源开采步伐。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时代，苗族的经济和文化得以自由发展，苗族文化变成了吸引中外旅游者的一种资源。

文化、结构和实践

苗族和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对待关系，尽管他们身处“偏僻”之地，但在中央行政之下，通过商业资本的运行和企业家的经营活动，苗族和世界政治经济已经联系起来。他们的居住地的丰富资源已经令“荒蛮边土”变成国防建设的战略要地，他们的传统文化成为可以吸引外国消费者的资源。纵观整个历史，苗族与国家主体的交往遵循着

[1] 朱总司令，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记下了他经过贵州时的印象：“当地农民称自己为‘干人’，因为他们被吸干了一切……盐巴有三种：精盐是富人用的，褐盐给中等人家，熬盐后剩下的渣滓给普通人……各处可见破旧的小屋，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黑色稻草。人们从地主的旧粮仓底下挖出腐烂的稻米当食物。”（索尔兹伯里）

[2] 见斯诺（Snow, 1978: 192, 268）。不过得瑞耶（Dreyer）推测说，虽然某些苗族对红军很忠心，但红军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遭到的严重敌视令他们重新考虑自己当初允许后者自立承诺。（1976 : 67-72）

一个秩序，使他们和殖民化经济关系及内部殖民化相联系。苗族在古代曾被认为是“野蛮”和“反叛”的，后来又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上“奇异”的。在那样的时候，他们从未和国家步调及标准同一化，而总是代表边界的、边缘的、女性化的他者的标志。(Bhabha, 1994)^[1]

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时代之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构成边缘化的文化行为翻新并强化这些文化行为。我认为：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就国家对于如何定位苗族，如何实现结构安排的一致性是有着争议的。各种力量——物质的和话语的、中国的和跨国的力量——迫使苗族和贵州继续成为提供资源的基地。然而，据毛泽东时代和他之后时代的“再分配原则”，无论政策执行中有多少补贴和优惠，都不能完全消除矛盾。在一个致力于让生产关系和文化差异趋于平等的体系里，苗族和贵州的其他农民作为生产者，怎么能够成为被剥削对象呢？本书记录的热切的文化活动正是发生在产生这种矛盾的现场。下面章节以具体文化行为为中心，认为文化行为并非因生计、因物质生产或对权力关系产生的附带现象，文化实践在社会秩序建构中至关重要。文化，尤其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文化，是指少数民族文化或苗族文化——如兰卡斯特（Lancaster）所说：“并不简单地是某种‘观念’，也非传统理解的‘意识形态’，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领域”（1992：19）。^[2]这种差异暗示，在苗族根本概念中出现了不对称关系的规律，此规律支配苗族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此规律是承认差异的规律，关系到财富、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毛泽东的哲学，原则上对此差异是不认可的。然而，许多目的本来在于根除这些不平等的平民而设计的具体政策，却只是重申这些不平等。到了后毛泽东时代，因为容忍不断扩大的社会财富和权力差距，对于市场化采取了赞许的态度，人们颂扬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以为这是某种成就。

本书的文化含义有一点标新立异——它打破了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之

[1] 安娜·青（Anna Tsing, 1993）关于印度尼西亚边沿政治的民族志部分可用在这里进行比较；如果说她所描写的大部分都与中央地带的政治边缘有关，那就已经超出了边缘的范围——她称之为所谓的“不受管辖地带”，如巴巴（Bhabha）所说的。

[2] 这似乎扩展了兰卡斯特的惯例。他描写了通常被认为文化元素之一的如在尼加拉瓜奉行的以男子为主的体系。兰卡斯特认为这一体系关键在于：男人、女人和儿童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它依其内部自己的理论运行并巧妙地将自己再现为“自然的”或“正常的”。（1992：20）

间脆弱的边界。文化的多种意义在西方人类学以及更广意义的人类学范围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试图限定这个边界几乎是徒劳的，因为具有多种意义的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促成我撰写了这本民族志。以下，我将文化的各种意义归结为三点，一一讨论它们彼此间的关系。^[1]

整体性 文化的第一种意义是习惯上应用于人类学范围的意义，此处，文化是一个整体，如泰勒（Tylor）归纳的著名定义：“文化或文明在广泛的民族意义上，是错综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规则、习俗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其他能力及习惯。”（1871：1）在此观点中，——特别是随着后来博厄斯（Franz Boas）著作的问世——这些相互关联的部分在整体论方法中被看作为不但是连贯的，同时也是各不相同的有区别的群体。^[2]特殊和有区别很关键；在人类学谱系当中，文化成为多元的文化，“是不同的思想世界彼此交流的媒介”。（Stocking, 1987：19）此概念作为区别社会各实体之间的差异而被接受，并被认为是相较于原来更多地从生理学角度区别种族，是一大进步。这种文化观点常常和民族性交替使用，以便将世界依假设的不同社会组织、不同语言、不同风俗和生产技术区分为彼此分离的人群。^[3]因此，苗族可以作为一例，由一系列分类特征来辨别，比如《人类学研究数据库》（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它通过语言、定居点、定居模式、住房、经济、生产活动、谱系、婚姻、家庭、宗教和社会政治组织等，来区分

[1] 的确，在整个 20 世纪期间，有许多方式以喻指不同的文化理念。人类学家将文化间的差异评论为第三世界“彼处”的文化和欧洲中心“此处”的精英“文化（culture 暗示与阶级有关的、较为精致的文化——译者）”，见拉威（Lavie）和斯威登堡（Swedenburg, 1996），及关于威廉姆斯（Williams）引起的讨论（1983：87-93），又见曼加那若（Manganaro）（即将出版）关于文化理念的书。法夸尔（Farquhar）及赫维亚（Hevia）（1993）对美国汉学历史编纂学中文化理念所起的作用提供了突破性的见解。

[2] 泰勒（Tylor）的定义虽然被认为创立了后人类学文化理念，依泰勒的观点，该定义却并不表明博厄斯（Boas）的多重性概念（斯多钦 Stocking, 1987：302-3）。

[3] 这里我们也可考虑热那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的历史定义修改版：“文化……广义地指人们借以使生活产生意义的形式，而非局限在歌剧或艺术博物馆里。文化不停留在特定管辖区内，它是平常的亦是深奥的，是世俗的也是高尚的，荒谬的并崇高的。总之，文化渗透到方方面面，无处不在”（1989：26）。罗萨尔多最终不再强调完全的一致却转而叙说矛盾和不平等的一面，以及他所称的“文化寄宿地”，在此，主题跨越了文化界限。